

计然及其商业思想考述

李晓燕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计然,春秋时期人,是一代巨贾范蠡之师、越王勾践之臣。“计然七策”是计然提出并广泛实行于越国,使越国富强的经济政策,是计然商业思想的集中体现。后代学者对计然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计然之策的探讨和辨析。

关键词:计然;计然里籍;商业思想

中图分类号:K8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9)05-0023-03

春秋时期,南阳人范蠡当政时助越国致富,进而称霸中原;但当他官运亨通之时,却急流勇退,为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从而获得“陶朱公”的美称,并有商圣之誉。然却鲜有人知道,范蠡的成就得自于其师计然的教导。

一、计然其人

关于计然其人,《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记载说,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对于此句中的“范蠡、计然”的身份关系,后代注疏《史记》与《汉书》的学者大体有三种认识:一种认为,计然是人名,是范蠡的老师。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史》有范蠡师计然。”三国时吴人韦昭说计然“范蠡师也”^{[1]卷二九,3259}。东晋人徐广也说“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算’”^{[1]卷二九,3259}。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汉书·货殖传》则说,计然“姓计名然,越臣也”^{[2]卷九一,368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计然是范蠡所著书的名字,把《史记》、《汉书》所记的“计然之策”称为“计然之术”列入范蠡名下,谓之范蠡“计然之术”或“范蠡的经济思想”。此种学说以晋人蔡谟为代表。蔡谟注《汉书·货殖传》说:“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2]卷九一,3683}。第三种观点提出“计然即文种”一说,如清人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以为文种即是计然:“计然名研,见班书叙传答宾戏。倪亦硯之譌,硯与研同,研然音近。”^{[3]122}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比较可信,即计然是春秋战国之际越王勾践的大夫,范蠡之师。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马总《意林》等,都有相关的记载。《史记集解》引《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这里的“字文子”,《史记索隐》引《范子》作“字文”。马总的《意林》所录《范子》对计然的介绍比《史记》引《范子》更为详细:“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著,其形浩浩,其志汎汎^①,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

称曰计然。时邀游海洋,号曰渔夫。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同利也”^②。^{[4]18}这说明:计然的先人是晋国的公子,从晋地逃亡到宋地的葵丘濮上,计然出生于此,所以是“葵丘濮上人”;计然的先人,在葵丘濮上时姓辛氏,所以计然姓辛氏,字(或名)文子。宋代郑樵《通志·氏族六》载:“计然本姓辛。”对于计然不是文种的证据比较明显,《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有“《大夫种》二篇”。班固自注说:“与范蠡俱事勾践。”^{[2]卷三十,1756}可见,文种有自己的著作,计然即是文种的说法很难自圆其说。

计然年少聪明,学习阴阳历数,能见微知著。他为人“有内无外”,即内有心计而不流露于外,有人说他“博学无所不通,明阴阳历数,尤善计算”,但因为他不肯自显,所以当时人不知他的真实姓名,“称曰计然”,并以计然著称于时。也正因为计然不肯自显,曾从葵丘濮上南游于越国海洋之地,自称“渔夫”。当时已是越王勾践之臣的范蠡师事计然,可能就是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于会稽山之时。当时计然虽认为“越王鸟喙,不可以(与)同利”,但最后还是由范蠡推荐做了越臣,成了越国“年少官卑”的大夫。至越灭吴以后,范蠡也认识到“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决然辞别勾践,去越入齐,在齐国曾写信给大夫文种曰:“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1]卷四一,1746}师生间对于越王的看法趋于一致。

关于计然的里籍,《史记集解》引《范子》记载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这其中有两个关键所在,即如何确定葵丘与濮上的地理位置。关于葵丘,《史记·封禅书》记载说:“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1]卷二十八,1361}对此记述,正义《括地志》解释说:“葵丘在曹州考城县东南一里五十步郭内,即桓公所会处也。”^{[1]卷二十八,1361}清康熙年间《考城县志·卷一·沿革》谓考城“金初属曹州,又改属睢州”。民国年间《考城县志·卷十》也记载说:“今曹之考城东南有北部城路史。”1928年,建置民权县时,旧考城地域从睢县划归民权县,因此,计然的葵

收稿日期:2009-06-09

作者简介:李晓燕,(1979-),女,回族,宁夏西吉人,历史学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秦汉史与中原文化方面的研究。

①洪进的《容斋续笔》写作沈沈(沉沉)。

②《容斋续笔》在“不可”下面有“与”字。

丘之籍在民权。关于濮上,《礼记·乐记》说:“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是之谓也。”^[5] 濮水古濮水是古济水非常重要的支流,甚至有文献将濮水当做济水的主支分流水道,如《水经注》中就没有将濮水单列,而是放在济水的水道中进行叙述。囿于史料的稀少,我们不能明晰濮水流经的具体地点,因此对于濮水最直观的印象还是《庄子·秋水》中关于“庄子钓于濮水”的记载,因为庄子的故里“蒙”地临于濮水,故蒙人庄子得隐钓于濮水上。“蒙”地在民权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也许是计然的濮上之籍在民权的一个佐证。

二、计然之策

中国古代的商人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总结自己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经商方法和原则,这其中最系统也是最出名的就是所谓“计然之策”。计然讲求“积著(贮)之理”,把西周以来的传统经济概念,特别是贸易和价格等方面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现在所能看到的“计然之策”,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粟,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粟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 卷一,二九,3259

计然从经济的角度谈论治国方略,又从治理国家转而阐述市场运行。具体到从商业运作的角度谈论操作手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这是七策之首,阐述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储备的重要作用,认为储备是奠定强大国家的物质基础问题。其二,“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第二策阐述了对自然界的认识是进行国家储备必须掌握的知识和行动准则,即国家储备的顺利进行,应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驾驭上。其三,“夫粟,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粟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国家调控农产品价格的理论和实践。其重大意义就在于计然最早认识到国家必须对粮食商品进行干预,维护社会各阶层人的利益,并且这种干预应借助于市场,而不是其他行政手段^[6]。其四,“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这条原则强调的是,在贸易中要妥善保存好商品的使用价值,加快流通速度,免得占压资金,减少利润。其五,“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这是说,在经营易腐败变质

和食物类商品时,一定要在其有效保存期内尽快脱手,不要贪高价,应薄利多销。其六,“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主要论述如何进行市场价格预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操作。最难能可贵的是,计然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对供求价值理论内容作出的清晰表述^[6]。其七,“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这是对整个商业精神的总概括。“行如流水”包含了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道理,即流通速度对利润率有巨大影响。计然这百余字的论述篇幅,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经济思想,如农业丰歉循环论、储备论、平粟论、“息货”论(商品流通理论)、价格论、货币周转论、国家调节论、自然贫富论及“积贮之理”等朴素商业理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商业经营管理原则,也因此成了很多商人经略的主要依据,也才有越国依据其政策“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的佳话。

后人所谓的“计然之策”包含如下几点经济信息:一是强调“知斗则修备”,即重视储备,更深的意思是要根据生产规律来决定经营方式;二是根据市场供应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三是要求国家用调节供求的经济办法来控制物价,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做到对产销双方有利;四是要求注意商品的质量,以“务完物”;五是要求注意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计然之策”用之于国则国富,用之于家则家殷。正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越王勾践“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1] 卷一,二九,3256 《汉书·货殖传》谓“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刷会稽之耻。”^[2] 卷九一,3683 《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记载,计倪(计然)为越王勾践“从阴收著,望阳出粟”,使“越国炽富”以后,勾践叹曰:“吾之霸矣!”并认为这是“善计倪之谋也。”《越绝书》说《计倪内经》记载计倪(计然)在越国能“循道顺天,富邦安民”^[7] 卷十五,73。这些史籍都说明计然的商业政策是越国国富兵强最有效的经济政策。

在老师计然的商业理论基础上,范蠡继承并发展了所谓的“天之三表法”。《越绝书》记载说:“范子曰:‘夫八谷贵贱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法矣。’越王曰:‘请问三表。’范子曰:‘火之势胜金,阴气蓄积大盛,水据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岁大败,八谷皆贵。金之势胜木,阳气蓄积大盛,金据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岁大美,八谷皆贱。金、木、水、火更相胜,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为邦宝。’”^[7] 卷十三,61-62 范蠡的“天之三表”探讨了阴阳、五行相胜与农业丰歉的关系,认为只有掌握“天之三表”,才能发展农业经济,才能成为发展越国农业生产的可行办法。

从内涵上看,计然的农业经济循环论相对比较超前和深。钱穆先生就此怀疑说:“今再就《货殖传》所引《计然》语论之,大抵言农事,言财币贸易,此乃中原自李悝、白圭以后人语耳。范蠡当春秋世,又居越,何由作此论?则《汉志》《范蠡》二篇,殆亦出后人假托也。”^[3] 120 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不会因为理论高深就说明春秋末期达不到,更不会因此就非得是

“出后人假托”。实际上,正是计然的商业思想,影响了李悝和白圭。纵观整个春秋战国的经济思想发展史,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

三、对计然的评价

计然事迹大多集中于《皇览》、《晋中经簿》、《吴越春秋》、《越绝书》、《意林》等典籍中。其形象是“仁义之治”,“去刑就德”,是一位“候天察地,纪历阴阳;观变参灾,分别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错行;福见知吉,妖出知凶”的史官。他曾是句践的重要谋士,参与了越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决策。越国灭吴之后,范蠡离隐,文种伏剑,《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记载说:“自是之后,计倪佯狂。”正因为与范蠡的一显一暗,因为史载的语焉不详,学者对计然的评价相对集中在对其商业思想的探究和分析上,大都将其作为商业理论的首倡者来论述,而实质上,计然作为哲学家和隐逸高士的身份也值得探究。

(一) 商业理论的首倡者

商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与商业实践相始终。《史记·货殖列传》中对计然之策的记载,除去他以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每年的收成好坏及每六年有一次丰收、每六年有一次干旱、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等带有主观色彩的说法之外,对于如何发展国家经济、如何平抑物价、如何使农业与工商并重,以及如何重视资金周转等有详细的描述。计然的策略思想与主张,不仅是发展生产与繁荣经济的治国之道,又是工商业者的经营致富之道。因此,范蠡用计然的商业思想于越国施行二十年,不仅雪国耻、打败了强大的吴国,而且挥兵北上,成为中国的霸主。即使今日看来,计然的商业理论仍有很高的价值。

(二) 哲学家

计然的哲学思想理论,大体上可以归于阴阳理论一类,而他的阴阳思想可能源自《周易》的阴阳思想,即认为一阴一阳的矛盾变化,就是“道”,这种阴阳变化,就是认为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转化,也称为“阴阳消息”。《范子》记载道:“范子问:‘何用九宫?’计然曰:‘阴阳之道,非独于一物也’。”^[4]这里所说“阴阳之道,非独于一物也”,是说天下万物都是由阴阳生成的,即“阴阳交通,万物成矣”,“阴阳万物,各有纪纲”。计然所说的“阴阳之道”,应该是《周易》中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越绝书·越绝外传·计倪》记载计然与越王勾践对话时曾引传曰:“《易》之谦逊,对过问抑威权势利器不可示人。”还摘引《易》中的句子“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7]卷九,等,显然是通晓《周易》的模样,并且深受《周易》论说的影响。所以,《越绝书·越绝德序外传记》说:“观乎《计倪》,能知阴阳消息之度。”^[7]卷十四,计然的经济思想也时刻贯穿着他的这一哲学思想。《计然之策》中“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就明显具有阴阳五行学说的特征。作为计然的学生,范蠡当然也

师承了这种哲学思想。

(三) 隐逸之士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们将自己的政治追求系于诸侯争霸的战车之上,一朝得立,一种学说被推崇,学者本人即被尊崇备至,是一种积极入仕的态势;一旦废黜,即退归山林,与世无争,即时效仿不食周粟的伯夷。及至两汉,甚至隋唐,这种因事而隐的文人儒士一直是中国古代“贤者”的惯性思考。计然也被认为是隐逸之士大概源于对其弟子范蠡品德和思想的剖析。

曹魏时期刘劭在《人物志》一书讲到“人之流业”有十二种表现形式时,说第三种表现为“术家”,进一步解释说:“思通造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8]又在《接识第七》中说:“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识遵法之良。”^[8]“术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张良,其受黄石公影响,最后又效仿赤松子云游山林,显然有逸者风范。范蠡既与之并列,则范蠡的归隐思想必然不少,范蠡既然如此,对其言传身教的计然有此倾向也就顺理成章。广为学者所博引的班固对古代人物的分类更能说明问题。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把自远古以来的人物按三等九级排列,九级中第一级谓之“圣人”,第二级为“仁人”,第三级为“智人”,第四级没有专称,属于中上等。在这一分类中,范蠡被列于第一等第三级,即“智人”,而“计然”属于第二等,即“中上”,就整体来说,为第四级,与计然同列的有仪封人、长沮、桀溺、丈人、何夔等人^[2]。而晋人皇甫谧在《高士传》中将这些人都归于有隐逸之风的高士,老子也被列入此等,正因为计然的思想作风确有隐者倾向,才能与诸多隐者同列。

作为越王勾践的主要谋士,计然不辱使命,向越王勾践献计献策,对越国的复兴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老师,他直接影响了一代巨贾范蠡的经营思想,并使之声名鹊起;作为中国商业理论的首倡者,他的商业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民权人,他也为河南悠久的商业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4] 马总. 意林[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5]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57:1746.
- [6] 郑克中. 计然为文种辨——兼论文种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J]. 东岳论丛,1997(3).
- [7] 越绝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8] 刘劭. 人物志(影印本)[M]//程荣,纂辑. 汉魏丛书.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陶谦】